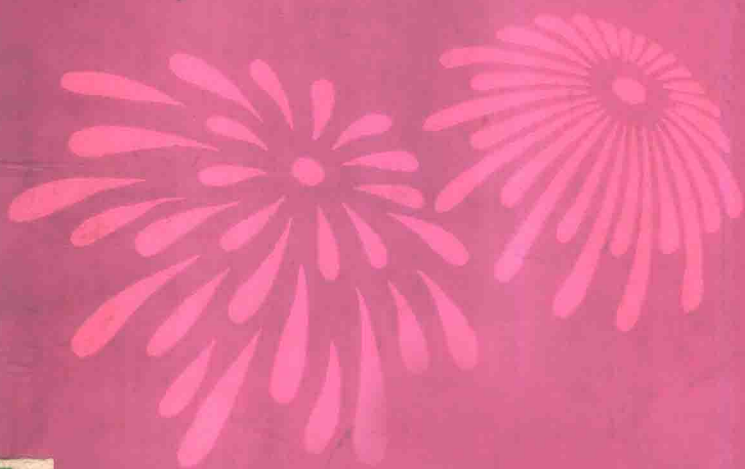


井上靖小説選



井上靖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8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4}$ 插页 2

197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531

定价 0.36 元

比良のシャクナゲ・胡桃林

ある偽作家の生涯・嫉妬

根据《井上靖小说全集》(第3、4、10、11卷)

新潮社 1975 年版译出

出版说明

井上靖是日本当代知名作家，1907年生于北海道旭川。1936年从京都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过《每日新闻》的记者，1976年获文化勋章。他的作品有《天平之甍》（1957）、《敦煌》（1959）、《苍狼》（1960）、《化石》（1965—1966）、《花坛》（1976）等，其中《天平之甍》的中译本，曾于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年以来，他曾多次访问我国，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核桃林》的译文，曾发表在《世界文学》（1962年1、2月合刊号）上，这次是重新翻译的。《比良山的石楠花》、《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和《弃老》则是新译。这四篇作品从几个方面反映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77年3月

目 次

比良山的石楠花·····	1
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	46
核桃林·····	98
弃老·····	139

比良山的石楠花

光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已经过了五年。阔别五年，我又来到了坚田的旅馆。上次来，正值战争结束前一年春天，那时战局越来越吃紧，打那以后五年的岁月流逝了。我仿佛感到那是遥远的过去，又觉得似乎是昨天的往事。总之，我近来对时间的概念好象模糊了。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上月份，在解剖学杂志上竟有人把我写成老当益壮的八十翁。我还不到八十，尚差约莫两年。不过，反正我在人们眼里已经是个老翁。翁这个词儿，显得温吞吞的，我讨厌它。我喜欢老学者这个词儿。老学者三池俊太郎。

这家旅馆的老板曾得意地介绍过，观赏琵琶湖的地方有十来处，三井寺、栗津、石山，以及其他名胜；湖畔虽然宽广，论眺望比良山，就得数坚田了，特别是这家灵峰馆西北面的客房^①，恐怕没有什么地方能与它媲美。他还说，在这里欣赏比良山的雄姿最令人心旷神怡，因此，

① 原文作“座敷”，日本式房子里的客厅或比较好的房间。

就把这家旅馆取名灵峰馆。坐在这间客房里眺望比良山，的确很美。隔着琵琶湖，从彦根极目远望，能看到山峦重叠的比良山蜿蜒向东西方向伸展开去；从这里望去，景色虽然没有那样雄伟，却有几条轮廓鲜明的溪涧贯穿其间，山脚宽阔，直伸到湖西，一部分山峰经常锁在云雾中；其姿容具有一般山峦所看不到的气势和风格，确实美得很。

说起来，自那个老板去世后不知过了多少年啦。二十年，不，还要多。当我为了处理启介的事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老板因患中风症，语音早已含混不清了。打那以后不久，我记得大约是两三个月后，就接到老板与世长辞的讣告。当时，在我看来，老板已经是老态龙钟了，其实他不过是七十岁光景。我想了想，如今，算来自己已经比老板多活了近十年。

这座房子毫无变化。我初次来这儿时，才二十四、五岁，因此，自从我第一次坐在这座房子的这间屋子里，不知不觉已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五十年来没有变化的房子也是少见的。这家的少东家酷似他死去的父亲，容貌相象，举止也一模一样。他坐在正门旁边微暗的帐房里。这间屋里那古色古香的壁龛^①内挂着的山水画和陈设的布袋^②的雕像，说不定也是当年的，原封未动。我的

① 日本式客厅里靠墙处高出地板的一块地方，用以陈设装饰品，墙上挂画。

② 我国唐代僧侣(？一)17)，日本列为七福神之一。

家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都变了。从家具到人，乃至人们的想法，几乎没有一样不曾起变化。而且年年月月都在变，也许应该说时时刻刻都在改变更为确切。象这样变幻多端的家庭，也是罕见的。每当我把藤椅搬到走廊上，一个小时后，照例方向就已经改变了，简直没法应付。

啊！如今多么轻松愉快啊。不知有多少年没有这样悠然自得地闲静过了。这才是学者的时间。就这样，可以避开任何人的眼目，独自坐在藤椅上，放眼欣赏湖光水色，眺望比良山。周围既没有带恶意的目光，也听不见愚钝者的恼人话声。想喝杯热茶，只需拍手招呼女佣人就成了。要是你不呼唤，直到傍晚都不会有人来。听不见收音机的声音，也没有留声机和钢琴声响，更听不见春子尖锐的叫嚷。听不见旁若无人的孙儿们的喧嚣，也听不见近年来变得颇为傲慢无礼的弘之的话语。

然而，话又说回来，此时此刻家里人一定张皇失措，因为我突然失踪了，全家想必闹得天翻地覆。近来为了避免发生万一，我绝不独自出门，可我现在已经离开家五个多小时，还没返回，恐怕连春子也得惊慌至极了。她准会到邻居或熟人家里去到处寻找，用她那通常的高嗓门嚷叫着：“我公公不知上哪儿去了，他老人家不在了。”弘之从电话里知道这事以后，会连忙从公司赶回家的。那小子就是那么个脾气，既不想告诉亲戚，也不愿意报告警察，可是往哪儿挂电话也找不到我的下落。他定会拉长

着脸在屋里慢腾腾地踱步吧。那小子好操心，也许早已将我失踪的事告知他的弟弟妹妹。定光从大学研究室折回家，说不定摆出一副我可不愿意为这样的事被叫出来的神色，现在正在我的书斋里，坐在我的椅子上，闷闷不乐地在喝茶哩。京子也会从北野赶来。要不是因为发生这桩事，定光和京子绝不会到我家来的。虽然不知道他们有多忙，不过，偶尔带点点心之类去探望孤单的老父亲也不至于遭报应的吧。可你只要不吭气，他们就可以一年半载地将老父亲抛之脑后，他们全是不孝子女。

管他呢，让他们担心去吧。等到明天中午，我才出其不意地回去。我这个七十八岁的人，也有我的自由，有出门的自由，有现时流行的那种自由。我悄悄出门，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并在外头随便留宿，从来就不曾向美佐预先打过一次招呼。有时三四天都不回家，从未象弘之那样，事先要给老婆挂电话声明。弘之本来就是怕老婆的，他放纵孩子，对老婆唯命是听，真是没出息的家伙。

不管怎么说，明天一回家免不了会闹一场纠纷。春子准会在定光和京子跟前故意大声嚷嚷什么：“所以说嘛，我看管公公可费神啦。”她就是那样，说不定还会埋怨地伏在铺席上抽泣呢。弘之、定光、京子都为我的事担心了整整一个晚上，非要把一肚子怨气发泄出来不可。我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挨个儿看看他们的脸，然后走进

书斋去。弘之尾随着我进来，摆出一副挺通情达理似的面孔说：“今后再也不能这样胡闹了。您多大岁数了，也不想想您都这把年纪了嘛。您这样闹，孩子们可受不了。多不体面呀。爹就是这么个别扭脾气。”随便他们怎么说好了，反正我不回答。不回答，只顾默默地凝视着挂在墙上的那幅施瓦尔贝先生的照片，凝视着他那意味深长的安详的目光。心情一平静下来，我立即打开笔记本，开始写《日本人动脉系统》第九章：

Im Jahre 1899 bin ich in der Anatomie und Anthropologie mit einer neuen Anschauung hervorgetreten, indem ich behauptete,——

一八九九年我在解剖学和人类学方面发表了新见解，受到注目。——

他们不会明白我写起什么来了。闪耀着三池俊太郎作为学者的永恒的生命与自豪的火花开头这一行，恐怕谁也不会理解吧。首先，弘之压根儿就看不懂。虽说他在学校也学过几年德语，可象他那样健忘的人也是少有的。定光是德语专业，并且正在翻译歌德的作品，恐怕勉强读得下来。不过，也许他只能读歌德的作品。他从小就有这毛病。他研究的歌德怕也是靠不住的。对歌德这位文豪，我终究是无知的，但是，他所研究的，恐怕只是他那一号的、过于拘谨的歌德吧。诗人歌德至少不是那

种与父母兄妹都合不来的、任性的人。他只记得歌德一个人，连至亲的父亲在做些什么都不知道，这种儿子也实在够呛。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研究日本人动脉系统的意义，软部人类学的朴实而重要的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学术上具有多大价值？他根本无法理解。至于弘之，不，不光是弘之，包括春子、京子，还有京子的丈夫高津等，恐怕宁肯要一百圆，也不愿意要我写的这行字。尽管这样，他们却尽量利用我过去在社会上的名声，诸如学士院会员、××奖获奖者或是Q大学医学系系主任等头衔，在外人面前几乎是卑鄙地打出我的招牌。这也未尝不可，不过，既然觉得作为我的孩子感到自豪的话，难道不应该更理解我，更尊重我吗？

或许大学里的横谷和杉山他们，也已从弘之那里得知我失踪的消息。他们可能都在担心我出奔寻死去了；不是对时局不满，就是由于从事研究工作，生活过得不顺心，所以起了自杀的念头。不过，倘使已死去的启介现在还活着的话，恐怕只有他才最能理解我的心情。他有一双和蔼可亲、炯炯有光的、好看的眼睛，最能摸透我的脾气。因为我这个大儿子是在我最贫苦的年月，在连檐房里成长起来的，所以在他身上有一种弘之或定光所不具备的、怪能体谅人的地方。从我这个作父亲的看来，这孩子的确有一股细腻的感情。

但是，怎么说呢，我最不喜欢启介啦。而启介呢，也

不象其他孩子那样跟我亲近。他从来不曾坐在我的膝头上。也许是由于当他懂事的时候我正在德国留学，我们长期分居两地的缘故吧。然而，我总觉得倘使启介现在还活着，恐怕只有他才最能摸透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并一边用冷淡的眼光直勾勾地看着我，一边默默地把事情安排得能使我的心情塌实下来。

尽管如此，我绝不死。我才不寻这种无谓的短见呢。刚着手搞的《日本人动脉系统》的工作，还没完成。纵令活到一百岁也做不完的工作，在等着我一个人去做；我要是死了，就谁也不会去搞这种事倍功半的工作了。我的生命是无比宝贵的。我的生命的价值，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错，也许在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一九〇九年在柏林召开的人类学会会议上，库拉阿齐教授曾给予我高度的评价。他说，他对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评价，恐怕要比我本人对自己的评价高得多，他盼望我珍重自己。在世上，他给予我最美好的赞辞。可是，这位库拉阿齐教授如今已不在人间了。佐仓、井口也都去世了。过去好象只有佐仓和井口这两个人才了解我的工作的价值。再说，这两个人也很了不起，做过出色的工作。然而，这两个人的名字也早已从学术界消失了。对他们两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价值，真正能给予适当评价的，也许只有我一人了。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又为什么突然想到坚田来呢。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我渴望坐在这家灵峰

馆西北角的房间里观看湖面的景色，迫不及待地渴望隔湖眺望比良山的雄姿，所以才来的。直接的原因，虽然与一万二千圆这点微不足道的金钱有关，但是，实际上决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

昨天，我曾向弘之讨那笔一万二千圆现金，这是卖掉原准备出版书而存放在大学地下室里的一部分纸张所得来的。弘之做了一副怪脸，显得挺不高兴的样子。他多半是认为，既然他在照顾我，这个年头生活又艰难，我变卖纸张的钱就是归了他，充当一部分生活费，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并不这样看。那些纸张本来是应该印刷我那部名副其实的毕生巨著《日本人动脉系统》第三册的。这是我在战争年代多方筹款，好不容易才买到手的，考虑到战火纷飞，才把它放在大学地下室里一直存到今天。对我来说，这些纸张比任何东西都更宝贵，更难得。它跟印刷一些无聊的小说或辞典之类的纸张可不一样。它将印刷软部人类学的创始人三池俊太郎五十年来呕心沥血的成果，假如生逢其时，这部书理应送到全世界各大学和图书馆里去。它和那里一般常见的纸可不一样。我的生命将化为数百万句德语，印刷在这些纸面上。我是想将这笔卖掉纸张得来的钱，放进桌子的抽屉里，好歹先让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好从事工作。长期以来，我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但是我的心境一点儿也不象个穷人。债是要欠的，不过，想买的东西就买，想吃的东西就吃，酒，每

天都足喝一气。真要成了一个穷极潦倒的人，还能作学问吗？不曾作过学问的家伙，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加之，那些纸张的事，也是由于我说走了嘴，弘之也好，春子也好，才开始指望它的。假使我不言声，他们不是就根本无从指望了吗？

我说，那笔钱是我的，你们可不能动它分毫。既不是讥消，也不是吝啬。我真的那么想。

“爹，您这样做，未免有点任性了吧。”弘之说。

我听了不由得恼火。如果他谦虚地说：“爹，我生活困难，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将那笔钱给我们一部分呢。说来的确很过意不去，不过，假如您肯这么办，可就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倘使他这么说话，我会当场重新考虑，虽不说拨一半，少说也要拿出五分之一给他的。

连春子也从吃饭间探出头来说：“我说你啊，爹说得对，本来就是爹的钱嘛。依我看，还是分文不留地全部交给爹好。”她正颜厉色地操着令人讨厌的口吻，吐出了这么一句。

“不错，是我的钱，随便拿去给孙儿买糖吃可不行。”我也回了一句。

弘之嗤的一声咋了咋舌头。他是我的儿子，举止竟如此轻浮，简直不能容忍。美佐要是还活着的话，绝不会让我受这样的气。但是，美佐也是个懦弱的女人，晚年开始讨好弘之和春子，所以她也是靠不住的。但是，因为这

是卖掉工作需用的纸张得来的钱，非同小可，所以估计她轻易不会听任孩子们的摆布。

到了今天早晨，事情更不好办了。我在书斋里刚要开始工作，春子手拿一叠一万二千圆的钞票走进来，将它放在桌面上；这还没什么，可是她说：“爹，您越来越财迷了呀。”

我并非财迷。我已经度过了七十八个年头，一生在清贫的环境中从事研究工作，就这样生活过来了。除了学问以外，我对什么也不迷恋。假使我贪钱的话，就会去担任临床学教授，然后辞职而去开业，那么如今早就成了大富翁了。如果我贪钱，我就不会蹲在微暗的研究室里一味摆弄死尸，仰仗实业家们的捐款，去撰写那一部也卖不出去的外文著作啦。春子却对我说了正相反的话。有这么错看人的吗？我生活在和学问简直无缘的公司职员家里那庸俗的气氛中，又逢上这个年头，靠那少得可怜的工资来受到抚养，自己不在抽屉里多少攒点私房钱就放心不下，就无法平静下来从事工作。他们对我拿出养老金来充当生活费，似乎不满。但是，如果我将它拿来充作生活费的话，我不就没办法付钱给课余帮我工作的学生了吗？要知道那笔钱眼下是我唯一的研究费啊。首先，作儿子的还想指望老子的养老金，不是太没出息了嘛！

我没有理睬春子。我觉得即使说一句我也嫌脏了嘴。我从春子手里接过一万二千圆现钞，并当着春子的

面，用我那颤抖的手，一张张地数着。确实有一百二十张。我接着就说：“好了，你到那边去吧。”

我在桌前坐了一会儿。沏了清茶，没有就点心，喝了一碗。当我将萩^①出产的旧茶碗（这是我庆七十寿辰时，一个不知姓名的学生，于我不在家的时候来了，悄悄地将它放在正门口，然后走开了。我很喜欢这个学生和这个茶碗）端到胸前，安详地喝着的时候，浓绿的茶水冒着小泡沫，慢慢地溢到碗边。

然后，我举目往庭院望去，在从大门延伸过来的树丛对面，我看到一个身穿西服、显得挺寒酸的汉子，朝着正门走过去。此人近来我曾遇见过两三次。我也知道他就是大森屋的掌柜。大概春子又在变卖腰带或衣服之类吧。衣服是她出嫁时带来的，变卖了也无妨。不过，还不至于困难到要变卖东西的程度吧。假如当真那么困难的话，不要让秀一学钢琴好了。每月付昂贵的学费，让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天资的十二岁的男孩子去学钢琴，有什么用！为此，不知给我添了多少烦恼！音乐这个玩意儿，只有天才才能一辈子搞下去的嘛。让八岁的桂子去学什么绘画，也是一样的。搞这一切，通通都是白费劲儿。什么情操教育，情操教育，所谓情操决不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不教育孙儿们去认识学问的宝贵，还谈得上什么情操教育呢？

一方面不该让孙儿们去学无谓的东西，此外还可以

① 日本山口县北部的城市。

通过很多别的途径来紧缩生活费用。据说春子前些日子在四条让擦鞋的擦了一双鞋就花去二十圆，真令人吃惊。而弘之呢，他非但没责备她，反而说自己在京极的进门处付了三十圆，还说什么那里的人服务得周到多了。四肢健全的夫妇自己不擦皮鞋，让别人擦，花掉五十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然而，又说什么生活困难要变卖衣物，真是前后矛盾。要是说当家的常喝酒，喝得酩酊大醉，所以生活困难，这个我理解。因为我的一生，事实上每天都过着这样的日子。每天都同研究和酒，解剖室和酒铺打交道。虽说我喝酒同样是浪费，但意义却有点不同。我决不会让人给擦鞋，然后节约酒钱。恐怕即便替人擦鞋，我也得喝酒。因为对我说来，酒是我的欲望。和学问一样，这是不可抑制的要求。

当大森屋的掌柜打开正门，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我站起身来，换上西服，并将我最喜欢的一枚勋章别在西服背心上；那是波兰政府赠送的小巧玲珑的红十字一等名誉勋章。我还将刚开始写的第九章的一部分草稿，连同一本德文辞典，装到手提包里。然后，又将一万二千圆钞票装进衣兜，因觉得衣兜不保险，又把它重新装进内衣兜里。于是从廊子下来，穿过里院，从后门走出大街。大概因为太激愤了，每跨一步膝关节都嘎嘎作响。

我慢腾腾地走到电车路上，可巧迎面驶来了一辆出